

新时期认识论领域的拓荒之作

——评《思维发生学》(增订版)

李 白 鹤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认识论问题虽然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热点,但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张浩同志的《思维发生学》(增订版)对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解答诸多“未决问题”的有益的思考路径和重要的理论启迪。

作为一部全面探讨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的专著,该书依据比较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系统地揭示和论述了语言与思维、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思维的个体发生与群体发生的关系等重要认识论问题,对于我国当前认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对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语言先于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作者在《思维发生学》(增订版)一书中则用发生学的方法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人类思维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大量材料,作者指出,语言是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随着思维的产生而产生,并且也总是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原始先民思维发生发展的阶段,大致是相伴而行的。作者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产生并非先于思维,语言是在思维的呼唤中产生的。并指出,古人类学的研究资料证明,早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已经有了直观动作思维和形象思维。语言思维是后来随着人类的发展出现的一种较高类型的思维。这表明,思维并非离不开语言。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原始人类思维的发展划分为:直观的动作思维——具体的形象思维——抽象的逻辑思维三个阶段。他指出,就思维的起源来说,不管是种系发生还是个体发生,思维的发生发展都要经历这三个最基本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是递进的,又是互相渗透的。掌握了逻辑思维能力的现代成年人,在进行思维活动的时候,也常常是以逻辑思维为主,三种思维方式交叉并用。作者关于“语言随着思维而产生,思维并非离不开语言”的结论,对于新时期关于默会认识、非理性认识等认识论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着眼于认识中所存在的“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讲述出来的多”的现象,在认识论领域首次提出默会认识理论。波兰尼指出,相对于在发生的同时就可以被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的、可以用言语清晰而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言传认识,在我们的认识中还存在着内在的、非言述性的“默会认识”。波兰尼认为,尽管在默会认识中默会成分支配一切,以致言述实际上变得不可能,但并不可以因此把一切不可表达的思维过程说成缺乏思维特征;因为在默会认识中,主体知道默会中的东西,尽管他无法清楚地说出或几乎无法说出他知道的是什么。波兰尼强调,默会认识尽管不可言传,但并不缺乏思维特征,它是一切言传认识的基础。《思维发生学》(增订版)通过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考察所得出的“思维并不完全依赖于语言”、“在现代成年人的思维活动中,也常常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交叉并用”等结论,为默会认识的存在提供了佐证,并为我们更深入地探讨默会认识的发生机制提供了借鉴资料。同时,《思维发生学》(增订版)也破除非理性认识的神秘性,为探究非理性认识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翔实而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资料。

第二,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观点曾有过明显的分歧。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究竟是对立的还是等同的,这是考察人类思维的起源与发生时无法绕过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在《思维发生学》(增订版)中详细考察了原始思维的基本特点,他指出,原始思维是一种尚未完全分化的思维,在原始思维中,主体和客体、客观映像和主观情感因素、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都处在一种既有分化又未完全分化的进化进程中。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原逻辑因素占统治地位的思维。而现代思维则是一种逻辑因素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但是,作者强调,在原始思

维和文明思维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原始思维并不是非逻辑的,而应该是潜逻辑的、原逻辑的或前逻辑的。逻辑结构一旦成为思维系统的基本结构,原始思维便过渡到文明人的逻辑思维了。在作者看来,在这一过渡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的四个因素是:个体意识的形成、知觉经验和矛盾律的渗入、“概念”的沉淀、想象力的飞跃。作者运用发生学的方法对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的关系的讨论,为关于人类认识和思维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首先,援引大量的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生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以充分说明人类认识与思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这也使得人类认识与思维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被引向历史、文化、语言等广阔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了认识论的研究视野。其次,运用发生学方法对史前时代的原始思维进行研究,对人类认识与思维起源、发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展现,不但充分说明人类认识与思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更是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历史统一的科学论断。这彰显了发生学方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更为进一步探寻人类认识与思维的奥秘提供了一把钥匙。再次,对个体意识、知觉经验、概念思维、想象力等因素在原始思维向文明思维过渡中的重要作用的关注,揭示了逻辑思维系统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这对于当前人们极为重视的“思维创新”的课题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三,思维的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的问题。思维的发生包括人类思维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原始思维和现代儿童思维两部分。虽然《思维发生学》一书的主旨是探讨人类思维的种系思维,但作者强调,儿童的思维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类祖先智力发展的缩影,如能用比较的方法,从研究儿童思维认识活动入手,以研究思维认识的个体发生过程,可以作为研究人类思维认识活动种系发生的必要补充。因此,在《思维发生学》的增订版中,作者加上了专门的章节特别地探讨了人类思维的“个体发生”相对于“种系发生”的缩影关系,并比较了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之间的同异。作者指出,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都存在着主客不分,都表现出“自我中心”的状态,都具有“泛灵论”和“目的论”的倾向,都是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但是,两者也不能完全等同,它们在生理基础、社会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作者认为,这些同异之处充分地证明了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是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

作者对人类思维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对比研究,对于认识系统发生论的建构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发生学角度对人的认识和思维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常见的有两大脉系:一是从类的发生史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孤立地单从其中的某一个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单从类的角度进行研究,史前人类思维认识发展史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有许多空白无法填补;如果单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又可能过分强调个体的生物因素在认识与思维发生过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人类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认识发生所具有的核心作用。认识系统发生论则把人类认识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认为认识和思维的系统发生既不能简单等同于认识和思维的个体发生,又不能完全归结为原始的类发生。它力图把人类认识和思维这一复杂的有机系统置于人类的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之中进行考察,以探求人类认识与思维的系统生成规律和一般演化模式,从而既揭示人类认识与思维的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把握在人类特定认识状态下个体认识和思维的发生和发展。《思维发生学》(增订版)对于人类思维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比照研究,展示了认识与思维的个体发生同人类认识与思维历史发展的同步性,并在个体发生的微观层面上更加具体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与思维的系统生成机制与规律。这些,对于在认识系统发生论中真正把认识与思维的个体发生和原始的类发生有机地统一起来,对于认识系统发生论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科学和实践的飞速发展,拓展着人们的认识视野,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问题,并对以往被认为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质疑。因此,新时期的认识论领域并非已经没有重要的问题可以探究,而是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为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可以说,《思维发生学》(增订版)在当前具有引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一部拓荒之作。该书通过对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考察,对思维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是按照什么规律发展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回答,并为认识论领域许多其它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资料,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新时期认识论的研究。《思维发生学》修订后的再次出版,将推动国内认识论研究走向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 严真)